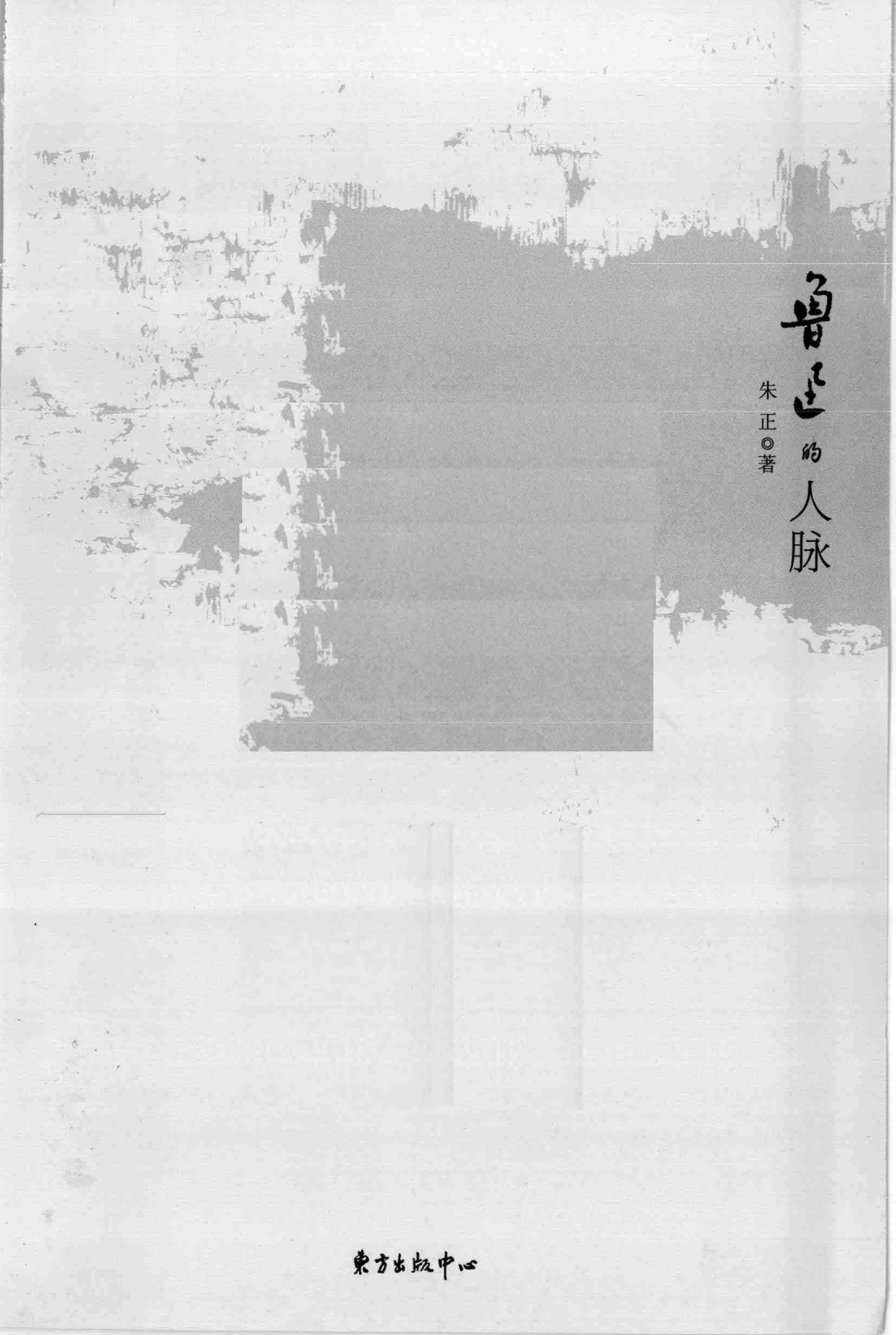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的人脉

朱正◎著

人们看他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
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
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，他的性格
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

东方出版中心



鲁迅的人脉

朱正◎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的人脉/朱正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0. 8

ISBN 978-7-5473-0192-0

I. ①鲁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-
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7238 号

鲁迅的人脉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6 千字

印 张: 9 插页 3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192-0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出版者的话

要了解一个人，可以看看他身边所交的朋友。
要想了解鲁迅，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交游。

鲁迅一生交游甚广，很多有关鲁迅的著作中都有鲁迅交游的介绍，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做且最后成书的，大概只有这一本《鲁迅的人脉》。从本书当中，“人们看他（鲁迅）交往的是些怎样的人，看他为友为仇的是些怎样的人，岂不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象，他的性格，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了么？”（朱正语）

本书作者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，出版过包括《鲁迅传》、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在内的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，本书的出版，填补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。

目 录

出版者的话

夏震武其人其事	1
---------------	---

鲁迅 1910 年 12 月 21 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,“木瓜之役,倏忽
匝岁”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
鲁迅与陈独秀	8
--------------	---

鲁迅和陈独秀都属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
他们都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,却并不同时。陈独秀是 1917 年 1 月
应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,1919 年 3 月底因受到反
改革舆论的攻击而去职。鲁迅是 1920 年 8 月 6 日接了北大的聘
书,前去讲授中国小说史,这时陈独秀早已不在北大了。他们两人
并不曾在北京大学同事。

傅斯年与鲁迅兄弟 20

鲁迅和周作人都是《新青年》月刊的重要作者。傅斯年以很大的兴趣和敬意细读了他们的作品,情不自禁地表示了由衷的赞扬。

《阿 Q 正传》的两个俄译者 38

《阿 Q 正传》第一个俄文译本是王希礼译出的。王希礼原名波·阿·瓦西里耶夫,是当时苏联支援中国革命的人员之一,在驻开封的冯玉祥系统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当翻译。在瓦西里耶夫之后,还有一个俄国人说是要翻译《阿 Q 正传》,那就是柏烈伟。柏烈伟也有译作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,当时在北京俄文专修馆、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。

小人张凤举 47

鲁迅对他,最初的印象是很好的,在给二弟的信中说:“前天沈尹默介绍张黄,即做《浮世绘》的,此人非常之好,神经分明。”从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知道,在那几年里,两人的交往颇为频繁。可是,这人却是一个小人。“小人”这顶帽子,是胡适给他戴上的。

鲁迅与左联五烈士 51

鲁迅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,是纪念亡友白莽、柔石、冯铿、李伟森和胡也频的。他们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员,遇难之后,被称为“左联五烈士”。

鲁迅与邵洵美 81

鲁迅与邵洵美没有过个人的交往。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出现过邵洵美的姓名。据现在所知道的,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,他们在笔会欢迎萧的集会上是见过一面的。

曹聚仁与鲁迅兄弟 97

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要比鲁迅、周作人兄弟小十多二十来岁，按辈分说，应该是属于学生一辈，尽管他并没有做过他们的学生。他在自传性质的《我与我的世界》一书中说：“五四运动前后，我们受了《新青年》的影响，对于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鲁迅兄弟的言论，不独心向往之，几乎奉之如神明。”作为杭州一师的一名学生，仰望着《新青年》上灿烂的群星，也就是这样一种心情吧。

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154

蔡德金编注的《周佛海日记全编》，收入周佛海1937年1月1日至1947年9月14日的日记，缺1939、1946年两整年和若干月日。其中有涉及鲁迅、周作人兄弟的点滴资料。

鲁迅与他的三个美国朋友 160

鲁迅定居上海以后，结识了三个美国朋友。那就是：艾格尼斯·史沫特莱(1890—1950年)；加罗尔特·艾萨克斯(1910—1986年)，一译伊赛克，中文名伊罗生；埃德加·斯诺(1905—1972年)。

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194

我们无法知道，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，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。我们确实知道的是，在他的交游中，确实有一些人后来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。像冯雪峰、丁玲、聂绀弩、黄源、徐懋庸、施蛰存、江丰、刘岷等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就不用说了。现在就我接触到的材料中再提出一些人，供读者参考。

鲁迅交往中的军界人士 250

鲁迅是文学家，可他的交游中也有军界的人士。其实他本人

也是军校出身。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江南水师学堂,就是海军军官学校。后来转学到矿路学堂,也是附设于江南陆师学堂即陆军军官学校的。如果他在水师学堂或者陆师学堂毕业了,不改行,他也会是一个军人吧。

后记	279
----------	-----

夏震武其人其事

鲁迅 1910 年 12 月 21 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,“木瓜之役,倏忽匝岁”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
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说了一个大概。1909 年,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课,“到了冬天,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,原因由于监督易人:衡山先生(引者注:沈钧儒)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,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,我们名之曰‘夏木瓜’。到校的一天,他要我陪同谒圣,我拒绝了,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,恕不奉陪。他很不高兴,我也如此。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,仅仅差送一张名片,并不亲自拜会,教员们大哗,立刻集会议于会议厅,请他出席,他还要摆臭架子,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。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,即向旧监督辞职,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,鲁迅便是其中之一。教员计有朱希祖、夏丐尊、章铤、张宗祥、钱家治、张邦华、冯祖荀、胡浚济、杨乃康、沈朗斋……统统搬出了校舍,表示决绝。夏震武来信骂我是‘离经叛道,非圣侮法’,简直



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参加“木瓜之役”的全体教员合影。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胡州会馆。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。

是要砍头的罪名；我便报以‘理学欺人，大言诬实’。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，我们便回校，回校后开了一个‘木瓜纪念会’。”

马叙伦《石屋续渚》中也有“夏震武”一节：

夏灵峰先生震武，字伯定，号涤庵，浙江富阳县里山人。以进士官工部主事，治理学，宗程朱，而实私淑晦庵。母歿，葬杭州西湖之灵峰，遂又号灵峰。先生庐墓三年，巡抚尝使致劳，睹芒鞋竹笠者不知即先生也，不为礼，先生因亦不语以姓名。知仁和、钱塘两县事者，以时候起居，夏孝子之名遂播于人口。服闋，赴曹，及甲午之役，劾李鸿章误国，不报，遂归田。至清末，刘廷琛为京师大学堂监督，聘为教员，先生以师道自居，朔望谒拜孔子，必先监督。某年，先生年假还里，过杭州，寓望仙桥槐旅馆，使招余往，率然问曰：“君看汤蛰仙为何如

人？”蛰仙，汤先生寿潜字也。时蛰丈方办沪杭甬铁路，有盛名。余知先生言必有谓，不敢遽对。先生曰：“蛰先，伪君子也。”余唯唯而已。辛亥后，先生里居不复出。余往候之，先生束发冠儒冠，衣深衣，俨然如对古人。余宿其宅，内外不闻语声。先生有弟则剪发矣。设米店于江边，弟司其业。然闻里山人云：买卖升斗出入不同，未知如何。余荷先生青目，昔时度藏其所遗书牒，经渐当付阙如矣。

清亡之后，夏震武要当遗老，不做民国的官，怎么营生呢？他是开了一爿米店，由他弟弟经营。据当地人说，他做生意可不大规模，大斗进，小斗出，不讲商业道德。用道学家的话说，就是欺心。这也印证了一句古老的名言：“黄金无假，道学无真。”说起假道学，还可以举一小例。不是说他是个庐墓三年的著名孝子吗？当年和鲁迅同在两级师范任教的杨莘耜，也是“木瓜之役”的参加者，在《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》一文中也说起了这件事：

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，短衣无辫。在夏震武看起来，这些人都是乱党，都是革命党，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，说他是个老顽固，说他是个假孝子（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，这种争论，在现在看来，也是很可笑的）。（见《鲁迅回忆录》散篇上册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）

刘福姚的《庚子纪闻》也说到了这位夏震武。庚子那年，刘是浙江乡试主考。他也是个顽固派。就在这篇《庚子纪闻》里说康有

为“实荒谬妄诞人也，与其徒梁启超喜言变法，将举中国而夷之”。他引夏震武为同调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光绪逃到西安。“诏求贤才，各省不闻有举者。余保荐数人，主事洪嘉与夏震武二人得引见。二人皆敢言，然当路不愿闻之，屡加申饬焉。”（见《义和团史料》上册第 226—227 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）夏震武是怎样的“敢言”，又受到怎样的“申饬”呢？

关于这件事，龙顾山人（郭则沅）在《庚子诗鉴补》中有一诗咏他：

新旧才人貉一丘，
虚名误尽过江流。
请看十六中兴策，
此士獐头亦虎头。

诗后的解说：“同光以来，朝贵宏奖虚声，于是浮薄之士竞侈谈时务，以弋名干进。甲申、甲午两役，误于此辈者为多。至是两宫西狩，慨念时艰，颇有乏材之叹，适工部主事夏震武，自里居奔赴行在，上中兴十六策。枢臣鹿文端（引者注：新任军机大臣鹿传霖）伟之，荐于上，命入对。夏自请使俄，争东三省和约，且举洪嘉与许珏为助。西朝不许，仅命赴北京参预和议。夏大失望，因具疏请斩王文勤（引者注：军机大臣王文韶），目为汉奸。朝旨责其狂妄，拟遣戍。鹿力为营护，乃削职归。其人通籍后，尝越职言事，忤朝贵，因乞终养，夙有风汉之目，非能当大任者也。杨子勤太守《庚子感事诗》云：‘新旧人才皆误国’，其言绝痛。”（见《义和团史料》上册第 153 页）

这事在《光绪朝东华录》里有一点记载：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

二十八日(1901年1月18日)上谕：“现因时事艰难，下诏求言，原期广益集思，有裨大局。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，条奏多未能按切时势立言，著不准行。昨据鹿传霖奏参：夏震武奏劾王文韶请置重罪，王文韶朝廷任用有年，克勤厥职，办理洋务，尚能分别轻重，斟酌缓急。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，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，殊属冒昧。姑念迂儒不达时务，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，免其置议。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。虽间有可采，究多窒碍难行，总之书生之见，不免好名，毋庸再行渎奏。嗣后言事诸臣，务须择其补偏救弊确实可行者，详细敷陈，以副下诏求言之至意。”

王文韶是军机大臣。《清史稿》卷437本传说：“拳匪仇教，文韶力言外衅不可启，不见纳。”袒护拳匪的端郡王载漪、辅国公载澜这些人早就想杀他，密疏劾他通敌，请置诸法。如果不是荣禄向慈禧担保，他真有可能跟许景澄、袁昶一样被砍头了。夏震武上条陈，请诛王文韶，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。可惜他提晚了几个月，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。闰八月初二(9月25日)已经发下了一道惩处纵庇拳匪诸王大臣的上谕，载漪、载澜等人都列名其中，给予处分。夏震武到十一月底还来上这样的条陈，也真是“迂儒不达时务”了。

夏震武碰了这个硬钉子并不知趣，还想寻找一个什么机会再一次表现一下自己。正好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：盛京将军增祺越权派人同俄国签订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，十一月二十八日(1901年1月18日)上谕：“奕劻等电奏，增祺派委已革道员周冕往旅顺，与俄擅立《奉天交地暂且约章》九条画押。等语。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，擅行委员，妄加全权字样，殊属荒谬。着交部严加议处。钦此。”夏震武以为这事对于他自己是一个机会，于是连忙写了一道奏折，请署工部尚书鹿传霖代呈。他在这奏折中说：

春秋之义，人臣无将，将则必诛。增祺擅派、周冕擅议，无君已甚，罪在不赦。此风一开，则十八省督抚皆可与各国私行立约，卖国之臣效尤接踵，国家号令不得复行于天下矣，臣实痛之。伏乞降旨，亟逮增祺、周冕，械送行在，申明正法。简人署理将军，立遣专使亲至俄廷，折之以大义，动之以至诚，晓之以利害。俄主英明，夙与英、日为仇，必不贪小利昧远图，以朝廷恩意结之，必欣然听命，归我东三省，昭布大义于天下，增祺之约一言立废。俄约既定，改各国之约如反掌耳。宗社存亡，两宫安危，在此一举。

既然“立遣专使亲至俄廷”是一件关系这样重大的事情，那么，由谁来担当这专使的重任呢？夏震武觉得他责无旁贷，毛遂自荐了。他在奏折中回顾了前一次上奏折碰钉子的事：

臣杜门二十年，被命复出，志在殉国，有死无二。迂儒谬论，屡荷优容，目击时艰，忧愤所发，力劾枢辅，并及部臣，越职妄言，分当窜逐。复蒙圣恩，曲赐矜全，奖其怀忠，免其置议，闻命感泣，图报无由。

接着，就表示了请任专使的愿望了：

伏念俄约关系存亡安危，必当以死力争。区区愚忠，愿仗天威，奉国书亲谒俄皇，喻以大义，动以至计。臣非敢苟为权宜之术，取济一时；实欲立中国自强之基，宣布上意。必令俄主感悦信服，返侵地归故疆，修好释嫌，尽罢要求，为各国倡。

中俄协力，振作保卫，弭生灵涂炭之祸，寝暴主分割之谋。救亡图存，止戈已乱，在于今日，间不容发，失此不图，后悔无及。犬马微躯，唯当被发入山，闭户待死。臣志素定，愿于至艰之事，力行所言。天恩许臣，臣即星夜兼程，前赴京师，熟商李鸿章，李鸿章必奋发感动。然后晤商俄使，先废谬约，疾赴俄都，与俄皇定议。臣必有以自效，必不误国辱命。如臣言不效，愿伏欺罔之罪，死无所逃。”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》上册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，第 916—919 页）

这一下就碰了个更大的钉子。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（1901 年 2 月 3 日）上谕：“工部代奏学习主事夏震武条陈一折。国家交涉事宜，何等慎重详筹。岂有以疏远小臣，自请简使，即可遽信之理。夏震武前请赴京先见李鸿章，姑允所请，冀抒一得之长。今乃妄请自充专使，并援引洪嘉与许璟同往。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，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，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，实属狂愚谬妄，自应予以重惩。姑念迂愚无知，从宽严行申斥，勿庸前往京师，亦不准再行渎请。”他想通过上书言事求得升迁的路是走不通了。

夏震武对自己的期许甚高，所以对只屈就了一个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，自然是极不得意。为了自我安慰，虽是小官，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，把这些新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教职员看作下属，颐指气使，于是激起了风潮。“木瓜之役”胜利，教职员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监督，这虽然只是一个学堂的事，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，却反映了新对旧斗争的胜利，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。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末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的变化。

鲁迅与陈独秀

鲁迅和陈独秀都属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他们都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,却并不同时。陈独秀是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,1919年3月底因受到反改革舆论的攻击而去职。鲁迅是1920年8月6日接了北大的聘书,前去讲授中国小说史,这时陈独秀早已不在北大了。他们两人并不曾在北京大学同事。



陈独秀

鲁迅是因为《新青年》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。陈独秀编辑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是“五四”时期最重要的期刊。第一卷名《青年杂志》,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。第二卷发刊已经是在袁世凯死后,就改刊名为《新青年》了。

后世的人们大概都会承认,《新青

年》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,批判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,在中国报刊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、影响最大的刊物。可是在它初出版的时候,反应却是颇为冷落的。就是鲁迅,起初也没有怎么重视它。周作人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中回忆说:

鲁迅早知道了《新青年》,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。那年(引者注:1917年)四月我到北京,鲁迅就拿几本《新青年》给我看,说是许寿裳告诉的,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,颇多谬论,大可一驳,所以买了来的。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,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,所以也随即搁下了。那时《新青年》还是用的文言文,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,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,在那里骂封建的、贵族的古文。(引者注:指刊登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作《文学革命论》)总结的说一句,对于《新青年》总是态度很冷淡的,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。(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,钟叔河编订,第12卷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163页)

周作人这一段回忆与事实有一点出入。并不是他到北京以后鲁迅才拿《新青年》给他看的。在这以前,鲁迅就已经寄它到绍兴家中给他看了。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:“上午寄二弟《教育公报》二本,《青年杂志》十本,作一包。”这“十本”,是当时已出的全部,即第一卷的六本,第二卷的第一号到第四号(1916年12月1日出版)。以后各期,包括刊登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第五号和刊登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的第六号,都是周作人到北京之后才在鲁